

# 宋明清时期宁波学者和谐文化思想资源探述

梁一群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浙江 宁波 315012)

**摘要:**历史上宁波学者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南宋“甬上淳熙四先生”从心学出发而倡导人心之和;明代方孝孺以强调文明政制的职责来关注社会和谐;王守仁则将社会和谐的基础深筑于“致良知”之上;而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则从对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造出发,致力于社会和谐的实现。所有这些,都对传承和倡导中华和谐文化的优秀传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中华和谐文化;宋明浙东学术文化;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0)02-0081-06

所谓和谐文化,是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阐释、传播、实施和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性状。历史上宁波学者有关社会和谐思想和学术传统,是中国大文化系统、特别是其中的儒家思想文化在浙东地区的传承和弘扬,同时又体现了宁波学者独特的思想创造。

## 一、南宋时期宁波地区学者社会和谐思想探述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内忧外患交集的时期,由于国力疲弱和连年战乱引起的财赋拮据和征收从紧政策,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剧。这也是宁波地区学者初步形成自己学术思想特色的时期,世所称“甬上淳熙四先生”即其代表。“甬上淳熙四先生”承继南宋陆氏心学,其学述虽各有所重,但大致都是从人心的修养着手来阐发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的。

### (一) 杨简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观点探述

杨简(1141-1226),字敬仲,慈溪人,世称“慈湖先生”。杨简师事陆九渊,从心的变化角度来理解外界的变化。他在《二陆先生祠记》中说:“人皆有恻隐之心,皆有羞恶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恻隐仁,羞恶义,恭敬礼,是非知。仁义礼知,愚夫愚妇咸有之,奚独圣贤有之?人人皆与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与天地同。”<sup>[1](6616-6617)</sup>

杨简在为官生涯中处处实践自己的为学见解,做到了言行一致。他曾先后在嵊县、温州等地任职,为官廉洁,常为自诫:“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官声甚佳,名动朝廷。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者,他的为政经验,是以自己的修身治心为着手之处:“尽扫喜顺恶逆之私情,善政尽举,弊政尽除,民怨自销,祸乱不作。”<sup>[2](卷四百七)</sup>从心学的理路出发,他认为为官者只要将己心之广大无边的“公”字发扬光大,就能做到做事公平合理,不枉私情,因而就能除弊扬善。对此,他在《论书》中曾说到:“人心即道心,心本常。故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为政为事,则其政可以常立,其事可以常行。不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为政为事,则其政不可以常立,其事不可以常行。”<sup>[1](6709-6710)</sup>

在政治上,杨简主张“厚富于民”,以“正德、利用、厚生”为内容的“养民三事”为一己要务,因而他在自己的理论著述和为官实践中,极其推崇孔子的“为政以德”说,可谓是身体力行,始终不渝。

### (二) 袁燮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观点探述

袁燮(1144-1224),字和叔,鄞县人,世称“絜斋先生”。在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认识方面,袁燮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君民一体”:“君民一体也。民固不可无君,君亦不可无民。天下

收稿日期:2009-06-09

作者简介:梁一群(1954-),男,浙江宁波人,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副教授。

之民所以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果谁之力乎?人君为之也。是无民君固不能相养也。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君而无民,岂能独立于上耶?”<sup>[3](15681)</sup>为此他要求治理者之心与被治理者相通,在解说毛诗《甘棠篇》时有言:“心纯乎天,发而为政,皆与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sup>[4](卷一)</sup>而在实际过程中,则应当贯彻“与天下共图之”的社会治理原则。在《论对陈人君法天礼子》中他详述此义:“天下之大,当与天下共图之,岂可不稽谋于众哉?患人才之难得,稽谋于众,必当有超卓逸群之彦;患国计之未丰,稽谋于众,必将有取与不穷之术;患边备之未修,稽谋于众,必将有御敌制胜万全之良策。触类而长之,凡事关利害,皆广咨博访,是为至公,是为天心,岂复有不当者哉!”<sup>[5](卷一)</sup>

袁燮把天下之和看作是自己分内之事,《絜斋家塾书钞》中他有名言:“自一身而言,动容周旋中礼,一身之法度也;由天下而言,纪纲文物,天下之法度也。一身之法度,即天下之法度也。吾身之法度苟颠倒错乱,则天下之法度亦颠倒错乱矣。”<sup>[3](15608)</sup>他因此而将修身一事看得十分重要:“谐之一字最要看。大抵处天伦之间,使粗不得,须是细密工夫在里面,调停谐和,工夫既到,自然感格。”<sup>[3](15584)</sup>和谐最要,是落于己身修养之中,是在家庭之中,推而广之,则为天下之大义,此即天下和谐之最根本处,也是袁燮在他那时为促进社会和谐所能做的最具基础性意义的事情。

(三)舒璘、沈焕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观点探述

舒璘(1136-1199),字元质,一字元宾,奉化人,世称“广平先生”。舒璘出自陆氏心学,却是走的笃实路子,为学“最为平实”。《宋元学案》说他历任各地教官,却关注天下之事,“素以天下为己任,虽居冷官,未尝忘世事”,“尤留心中朝治乱之故”,<sup>[6](5)</sup>对荒政、茶盐、常平、义仓、役法等都有论说。舒氏深感当时纷繁的社会矛盾对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负面影响,他《与某书》中说到:“今民病极矣!”“民几无生理。”<sup>[7](6457)</sup>而《与陈仓劄子》则云:“民病至骨,往往偿租之外,便以绝粮。”“亦甚可怜矣!”<sup>[7](6472)</sup>

他在《与丰郎中书》中,深以上述社会问题为忧:“当今时势,深有可忧,士大夫调停之功多而正大之议少,和同之风炽而笃实之意亏。”<sup>[7](6459)</sup>他认为解决社会问题之道,不仅在于“调停”“和同”,更在于原则性的“正大之议”确立,以及切切实实的“笃实”功夫之履行。从他《论保长》一文主张合理税收,“使商贾乐于途”的建议中,<sup>[7](6474)</sup>可以看到舒璘在解决社会问题以促进和谐方面的广阔视野。黄宗羲《宋元学案》说他“所论常平、茶盐、保长、义仓、荒政,皆凿凿可见之行事,而言学者甚寡”。<sup>[6](9)</sup>可见舒璘有关调整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之可贵。

沈焕(1139-1191),字叔晦,世居定海,后迁鄞县,世称“定川先生”。沈焕家传为二程之学,他后来与陆九龄为友,又“以师礼事之”,倾倒于陆氏心学,但又与永嘉薛季宣,特别是金华吕祖俭交往甚多,晚年又倾倒于朱熹之学。沈焕也是将陆氏心学向平实一路推展的。今存《定川遗书》卷二《训语一》中有他名言:“学者功夫,当自闺门始,其余皆末也。今人骤得美名,随即湮没者,由其学无本,不出于闺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实,自谓见道,只是自欺。”<sup>[8](6543)</sup>他将天地万事万物的根本归之于人之一心,要求充分发挥人心之主观能动性,力振世风,以兴国立民,促进社会和谐。他的《净慈寺记》有云:“余观人之一心,精诚所达,虽天高地厚,豚鱼细微,金石无情,有感必通,况数椽之兴废乎?”<sup>[8](6542)</sup>沈焕为太学录,用自己的日常所躬行者感化诸生,循循善诱,他坚持将自己的职业生涯与道义之学联系在一起。沈焕不仅为学力行笃实,他为官,也是务求实效,不为虚声,曾赈灾于上虞、余姚二地,有大成效;知婺源,政声亦颇佳。

## 二、明代宁波地区学者的社会和谐思想探述

经两宋时期的“庆历明州五先生”及“淳熙甬上四先生”开拓和浇灌,宁波地区的学术渐趋繁盛。明代宁波地区学者们思想开放,不株守绳墨,积极探索思想领地中的前沿性问题,他们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对此后宁波乃至全国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方孝孺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观点探述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

宁海人。著有《逊志斋集》、《方正学先生集》。从学脉上看，方孝孺并非南宋以来盛行于宁波地区的心学之传人，可算是当时金华学者宋濂的学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可以看作是以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创始人的“婺学”传人。

1. 以文明制度救济自然之不足：方孝孺和谐思想的根本理念

方孝孺关于社会和谐思想的观点，架构于他的社会文明制度救济自然现象之不足这一理论图景中。他在《体仁篇》中说到：

天生之人，岂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有所不能。故托诸人以任之，俾有余补不足。智愚之相悬，贫富之相殊，此出于气运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齐也，而卒不能免焉。……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势不可也。势之所在，天不能为，而人可以为之。故立君师以治，使得于天厚者不自专其用，薄者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后天地之意得圣人之用以行，而政教之说起。<sup>[9] (50)</sup>

以此来看，方氏认为人类文明政教的设置，就是为了解决人类固有的不平等状况，调解其关系处理中的是非曲直，救济其不足，教化而提高他们的文明程度，提高他们的能力。他将社会治理者的责任设定于此一基本上，同时，他也看到了由此而来的又一种不平等现象开始出现，如何应对此一本来是为了拯济人类在自然意义上的不平等而产生的新的不平等情况？方氏仍是以拯济人类的不平等现象这一基本立场为出发点，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所在就是民众，因此，一切社会文明制度的设置之合理与否，端视其能否有助于解决人类生来的自然不平等状况，以及其解决的程度如何。

2. 为政者职在养民：方孝孺和谐思想的重要原则

在著名的《甄深论》中，方孝孺将社会治理者的根本任务加以严格设定：“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sup>[9] (162)</sup>君主的职分所在，就是为了民众，即拯济存在于他们之中的天生不平等而产生的一切社会问题。正因为有调剂和补救人类自然形成的不平等状况之需要，才有了社会治理者。因此他在《君职》中要求社会治理者们应该清醒

地认识到：“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势不免粟米布帛以给之者，以为将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济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乎尊荣恭顺之礼，此民之情然。”<sup>[9] (76)</sup>然而，现实中的社会权力如数上交的长期后果，就是掌权者的彻底腐败堕落，此即历来中国政治架构的根本问题所在。方氏有见于此而发为确论，将此根本症结点明，在中国思想史上，他是较早明确提出此一问题而深刻论述之的。

方氏虽囿于时代局限而对为政者（尤其是君主）所持特权这一最终造成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的现象予以认可，但他是在君主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养民”职责这一前提下认可的，而非毫无代价予以认可。而且他对现实中的君主拥有特权而为所欲为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极其激烈的批判。

方孝孺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观点，在那个时代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他针对社会治理者的职责所在而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对于抑制君主政治历来就有的君权膨胀，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对于促进民生，对于增进社会自治能力，直到现代都有借鉴意义。

（二）王守仁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观点探述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余姚人。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创新知行合一之学，后专以“致良知”教化学者，一时风靡天下。王学在当时引起的轩然大波，确由于他所秉持者对思想界的禁锢状况大有冲击之故。

1. “致良知”：王守仁社会和谐理想之实现的心理基础

王守仁著名的“致良知”之说，当然是来自孟子的“人皆有不忍之心”一说，当然，他是发扬了孟子之说的，然而有他自己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如他在《大学问》中说到：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sup>[10] (968)</sup>

如此天下皆为一体，则人心自有良知为固然本有之理，这是阳明构筑他和谐理念的基本点。他认为当局者必得有此出发点，才可以做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

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sup>[10](968)</sup>以此为教,则天下将和谐于一体之中——他自己的学说,就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答顾东桥书》有他想象此种教化所达到的理想境地一段著名阐述:

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sup>[10](54)</sup>

2. 行教化:王守仁社会和谐思想之实现的必要条件

阳明将其学问之基放在人心之中,不仅使得儒学如顿逢活水而生机盎然,而且将儒学所揭橥之天下大同及和谐理念与人心打成一片如水乳交融不可分割,更使之直立人心而不可动摇,此即《答陆原静书》所谓:“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sup>[10](69)</sup>在此意义上,王守仁把人所本具的心知情感与其社会活动二者打通,使之不具隔阂,而二者合于一致,如他在《答顾东桥书》所言:“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之皆得其理矣。”<sup>[10](45)</sup>

由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致良知”,推衍到家国天下万事万物,则可视天下万事万物为一体,这就达到了最根本的、也是至高而又至平实的社会和谐之境,此即《答顾东桥书》中所谓: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充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sup>[10](54)</sup>

这种视天下万物为一人一家之亲的看法,是阳明认为社会问题可得根本解决、社会和谐可得实现的理论依据,也是他专注于学问教化而孜孜

不倦的原因所在。阳明将人心之良知提举为诸事诸务之要,是他对传统中国的和谐思想文化之重大贡献。社会和谐以至于天下大同,在阳明看来,根基在于人心中的良知,而良知之发明提举,全在当人的自我了然与清明提撕,然后以学问修为灌溉培养之,如是朝廷上下打通而内外贯注,是他理想之境地,而作为社会制度性的保障,在他的实践中,为后人留下的是其尚有待于展开和完善的乡村基层建设的规划和设计蓝图。

### 三、明清之际宁波地区学者的社会和谐思想探述

清代宁波地区浙东学人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观点成就,可以视为晚明时期的思想解放经明清鼎革一大变故之后的思想自我检索成果。此一成果,是在对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王朝覆灭的深刻检讨,和对思想界的自我发展究竟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深刻反省基础上产生的。兹以黄宗羲为例予以述说。

黄宗羲他们一代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思想理论的角度来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最根本问题,或者说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深究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即天下治乱的问题。黄宗羲由此着手开掘他的学术新理路,黄宗羲对此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于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

1. 社会动乱的病原:社会权力机构的私有属性

检讨中国历史上的治乱轨迹,黄宗羲认为其实是“有乱无治”。而其根本原因,如他《明夷待访录·原君》所说的,正在于:为政者把政治权力视为一家一姓私产而为所欲为,正是这种“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sup>[12](2)</sup>的利益导向,种下了社会动乱的根子,最终引起整个社会的不安定,导致社会的破败衰落。

2. 社会和谐的实现: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造

黄宗羲认为,社会权力的私有化趋势愈益扩大,其结果是政权败坏,导致整个社会由稳定走向失序乃至动荡,最终致使人民受苦。有鉴于此,他提出了以制度改革来促进和谐以确保社会稳定、天下太平的一系列设想:

(1) 清君权。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

君》篇中认为,君权之产生,本是为了实现和满足天下人的私利。但高踞政治权力系统之最高位而拥有莫大权力的历代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sup>[11](2)</sup>正是此一趋向,导致整个权力系统乃至整个社会“视天下为莫大产业”而明争暗斗不止,最终导致天下之大乱。他认为在讨论社会和谐以及天下大同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高理想之时,首先必须解决的,正是这一现实问题。在此,黄宗羲的批判锋芒直指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部位,当然黄宗羲的原意,是要在君主政治框架范围内找到适当的均衡之道,以此实现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

(2) 明臣道。这首先是从理念上的明晰入手的。黄宗羲认为,一个政治权力系统中的官员,都是为“天下”、即社会治理而设置的,其权力本源并非属于君主,并非自上而下,而是应该来自整个社会。《明夷待访录·原臣》篇中说:

则臣道如何而后可?曰: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sup>[11](4)</sup>

但是,历朝历代的政治权力授受关系的颠倒,却把设官的基本准则混淆了。黄宗羲对此进行了激烈批判:一方面,“世之为臣者昧于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为人君橐中之私物”。<sup>[11](4)</sup>另一方面,“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sup>[11](5)</sup>这样,就失去了设官为治的根本原则,也就失去了设官为治的理由,其后果不啻是鱼肉人民,烂毒社会,甚至造成天下不复之劫。由此黄宗羲深感在政治权力系统中实现治理理念的根本性转变之重要:“盖天下之乱治,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sup>[11](5)</sup>

(3) 立大法。如欲匡正官员的从政理念,

整个社会应该确立一种治理上的根本大法,此即社会治理的根本性法则,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称为“法外之治”,或曰“无法之法”。其理念的最根本一点,就是“藏天下于天下”。<sup>[11](6-7)</sup>

为君主一己私利之法,就是“非法之法”,是为了保全社会治理者们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法令愈多而天下愈乱;而所谓“三代之法”,是把“天下”和“万民之忧乐”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不仅仅是某一集团的利益。因此,天下人的利益,不能藏之于某些私利集团的筐筐之中,而只能是藏之于天下人的共同利益之中。在此,黄宗羲是把天下人的利益实现与否,当作评判社会治理中的法令规章制度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

(4) 设学校。为实现以“藏天下于天下”的根本大法来治理社会使之臻于和谐的理想,就得有一个将天下打通,也就是将朝廷与民间两者打通的具体设计,此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所谓的“学校”。在黄宗羲有关和谐思想的阐发系统中,“学校”作为对政治权力系统及其治理过程的监督,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在黄宗羲看来,社会治理过程中,“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sup>[11](10)</sup>“治天下之具”就是有关社会治理的政策措施、法令典章。他以“学校”为讨论和议定国家大事的机构来设计社会治理系统,目的在于使“学校”这一民间议事和咨询机构能够与朝廷的行政部门真正互通互融,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通,彼此无隔无猜,便于社会整合,便于社会政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便于立法创制的切实可行性,而不至于重蹈由于权力机制失衡而带来的畸轻畸重,及其治理过程中的无序。

#### 四、宋明清时期宁波地区学者和谐思想探述的几点启示

历史上,学术思想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精神之形成,其中和谐思想的学理讨论对于一个地区的和谐文化精神的影响,对我们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不无启示。

1. 一个地区的思想文化系统有所建树,来源于丰厚的学脉流传和发扬,其中首要者为基本的文化教育普及和深入人心。所谓“基本”,不仅指识字断文或是知识性的传授,更是指对于知

识和学问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及其所带来的人生根本规划和精神走向。对于人生根本意义的探讨和领悟,是一个文化系统中和谐思想的发展得以强劲支持的基本点。

2. 主体精神的凸现及其弘扬,是学术精神得以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主体精神的凸现,表现为对于基本文化精神的体认和感悟,既非拒斥文化积淀,又非盲目认同,而是求诸心证,即个人体认与文化积淀的“同构”模式之实现。这又表现为学者以其个人体认而对于文化传统的不断发展,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个人的体认是受着一定的文化精神影响的,但一种文化精神要不断起此影响作用,必须是在与历代学者的心理同构方面找到了坚实的契合点,从而使得该时期精神主体的凸现和弘扬有其支撑点。

3. 和谐思想的探索和发展,离不开学术思想文化的灌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学理上的求证及其相应的理论支持。在此,学者的心态又必须是充分开放而有容纳性。学术精神上所具有的“和同众长”特征,决定了其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这方面,宁波地区的学者表现出相当的胸襟气

魄,因而也就有他们相应的眼光和成就。宁波地区的学术发展轨迹,正是“和衷同济”这一和谐精神的充分体现,故能影响一个地区的文化精神至深。

#### 参考文献

- [1] 杨简. 慈湖遗书[M]//张寿辅辑. 四明丛书. 扬州: 广陵书社, 2006.
- [2] 脱脱. 宋史[M]. 中华书局, 1985.
- [3] 袁燮. 絜斋家塾书钞[M]//张寿辅辑. 四明丛书. 扬州: 广陵书社, 2006.
- [4] 袁燮.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7.
- [5] 袁燮. 絜斋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7.
- [6]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 第六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 [7] 舒璘. 舒文靖类稿[M]//张寿辅辑. 四明丛书. 扬州: 广陵书社, 2006.
- [8] 张寿辅辑. 定川遗书[M]//张寿辅辑. 四明丛书. 扬州: 广陵书社, 2006.
- [9] 方孝孺. 逊志斋集[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0.
- [10]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 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1]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 A Probe into the Harmonious Culture Resources of Ningbo During the Song and Qing Dynasties

LIANG Yi-qun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Ningbo Municipal Committee, Ningbo 315012, China)

**Abstract:** Ningbo boasts rich cultural heritages about social harmony in history. The Four Scholars of the Chunxi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namely, Yang Jian, Yuan Pan, Shu Lin, Shen Huan) advocated a harmony of mind based on the shingaku—the philosophy of the mind; Fang Xiao-ru of the Ming Dynasty emphasized that a civil political system need to focus on social harmony; Wang Shou-ren based social harmony on the “nurturing innateness (intuitive knowledge)”; Huang Zong-xi (or Huang Tsung-his)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evo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harmon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These thought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harmonious culture of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harmonious culture; academic culture in east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deological resources

(责任编辑 李亮伟)